

全球化中的跨文化与跨主体关照

(法) 李比雄 著
程小牧 译

1987年，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建校九百年之际，艾柯主持的跨文化学院邀请广东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加入“转换人类学”(Anthropologie alternative)研究计划。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历史学家胡修为在接受邀请时说，“经过如此漫长的等待，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。”“这个机会”是指中国学者赴欧洲进行田野调查、以不同的世界观与欧洲学者进行交流碰撞的机会。

跨文化研究的网络就这样建立起来，二十五年来，其宗旨即致力于逐渐转变认识世界的角度及其表征模式，这一角度和模式统治着通常被称为“人的科学”(不太理想的称呼)的领域；致力于日益更新这个领域所参照的概念与方法。这就是要努力把中国与欧洲文化自身的基本概念、方法甚至认识论模式分别纳入视野之中，并在语义学的多样性中通过它们来观察“当下”。

原则简单，实践困难。这片转换与交互人类学的田野，首先参与其中的是几位非洲学者，之后是一群中国学者。

此人类学的预设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即相互认知的预设，也是一个多样性的预设。这里，我们已接近全球化论争核心问题的第一个悖论：全球化使得跨文化的考察成为可能，因为全球化使我们走近那些在“远观”中被忽略的多样性的细节，艾柯曾谈到过这种“远观”；然而同时，全球化也趋向于减少和消除这些多样性的细节。这是全球化的首要危险，早在二十世纪初，醉心于中国文化的诗人谢阁兰就已经指出：“多样性的减损，这是人类重大的危机。”

尽管人类学家列维-施特劳斯对能否保持多样性持悲观态度，但他还是抱有希望。然而，如果设想多样性能够保持并且永远保持下去，这不是也包含着混乱和不和谐的危险吗？从今以后，如何在共同的视野中，确认、维系我们各自的价值传统与文化模式并使之产生有益的结果？如果这样一种设立在新的方法论或元方法论基础上的考察是可能的，借助它来重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制约，并对历史进行充满活力的重新解读，我们能够创造性地面对未来，并创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吗？

在这种视野的关照下，我们的论坛汇集了优秀的学者和思想家，包括科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，他们各自从本学科出发进行的分析研究是不可替代的。论坛只是想指出在跨文化研究的共同道路上，我们遇到的一些潜在的障碍，它们可能危及我们在这场论争中获取的观点，论坛也想虚心倡导那种有益的试探性的态度，这样的态度本身能够使跨文化的研究道路变得平坦。

在第一部分，我试图讲清楚这些潜在的障碍，借助我们自身朴素的经验，以及西方历史上，各个不同的作者曾经作出的种种分析，比如希罗多德、莱布尼兹、拉封丹或近代的尼采、胡塞尔、维特根斯坦和本雅明等等。在我看来，这些分析证明了在确立跨文化的视野之前或同时，必须在观察者之间建立一种跨主体的关系，这种关系是根植于个体与历史语境之中的。

第一部分主要回顾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及寓言家、道德家拉封丹的观察思考还有莱布尼兹论述的范畴与概念(参考他的一篇谈中国的“自然神论”的文章及他对“万有归神说”Apokatastasis Pantos的更为抽象的研究)，以及维特根斯坦(他说，眼睛看不到它自己)从另一个角度即语言哲学的角度，试图证明的文化及主体的种种隔阂与限制，这些限制必须通过相互认知去克服。

第二部分特别考察了尼采(他的“批判史”及“价值互估”(transvalorisation)概念)、胡塞尔(《笛卡尔沉思》中的“交互主体性”(intersubjectivité)概念)，试图勾画出超越“交互主体性”与“交互文化性”